

胡玉冰 著

汉文西夏文献丛考



西夏研究丛书

陈育宁 主编

西夏研究丛书

陈育宁 主编

汉文西夏文献丛考

胡玉冰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058472

22.2482
283

西夏研究丛书·第三辑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制: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厂址:银川市保伏桥西 200 米

邮政编码:730030

邮政编码:750001

电话:(0931)8454246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开

版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字数:1131 千

印次:2002 年 6 月第 1 次

印张:45.5

印数:1—1000

书号:ISBN 7—80608—705—2/K·107

定价:(全六册)136.00 元

编 辑 说 明

宁夏大学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开始注重西夏研究,1981年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内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西夏学讨论会。90年代初成立直属学校的专门研究机构——西夏研究所,2000年更名为西夏学研究中心。

十多年来,在学校与科研处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我校西夏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迄今出版专著18部,发表论文200余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18项,获省级以上奖励15项。1992年西夏学被学校列为首批重点建设学科,199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7年我校被宁夏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确定为宁夏西夏学研究基地,2001年西夏学研究中心又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我校的西夏学研究得到了甘肃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上述西夏学研究专著大多由该社以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版,1995年出版第一辑(《西夏学概论》、《西夏文化概论》、《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西夏王陵》、《西夏书事校证》)。1998年又出版第二辑(《西夏天盛律令研究》、《西夏经济史研究》、《西夏道教初探》、《西夏纪事本末》、《西夏志略》)。现在的第三辑是在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立后组织的,由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陈育宁教授主持,征稿范围由宁夏大学扩大到全国乃至国外。

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长期任务,以后每两年左右出版一辑(4—6种),选题包括西夏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文献、文物、考古、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

各个方面,体现我国西夏学研究最新成果。本着扶持人才、培养西夏学研究后继力量的精神,丛书对较少名望但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学者适当给予倾斜。衷心希望社会各界与同行专家给我们的工作以大力的支持。

《西夏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2年1月18日

承百年传统 创未来新业

—《西夏研究丛书》序

一

西夏是建于公元 1038 年,以党项羌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鼎立,公元 1227 年为蒙古所灭。元修宋、辽、金三史,惟独未为西夏修一部专史。经过元、明两代,党项羌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融合到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中,因此党项羌及西夏王朝的历史文化逐渐被后世淡忘。直到清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由于崇尚考据学,学者由经学转向史学,当时尚属空白的西夏历史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另一方面自 19 世纪开始,外国殖民者觊觎我国西北地区,极大地刺激了爱国学者致力于包括西夏史地在内的西北史地研究。他们掇拾残余,补苴史阙,撰写出多种西夏专史,重要的有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吴广成《西夏书事》、周春《西夏书》、陈崑《西夏事略》等。与此同时,公元 1810 年(清嘉庆十五年),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在家乡武威清应寺发现了砌封多年的西夏凉州感通塔碑,并判定碑阳为西夏文。另一位清代学者鹤龄首次释读《佛说妙法莲花经》的西夏文经名与卷数。

19世纪清代学者对西夏历史的研究,依然采取的是传统的封建史学观点、方法和体例,西夏文字的发现,也仅停留在狭隘的考据范围内,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作为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西夏学,应从20世纪初国内外学者对黑水城西夏文献研究开始。1909年沙俄大佐科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盗走了大量西夏文献与文物,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冬宫博物馆;英人斯坦因步科兹洛夫后尘,1914年也到黑水城寻找挖掘,得到不少西夏遗物,藏于大英博物馆。和敦煌文献问世后的情形一样,黑水城西夏文献出土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苏联学者首先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涌现出伊凤阁、聂历山、克恰诺夫、索夫罗诺夫、克平等一批西夏学家。聂历山教授的《西夏语文学》及其所附的西夏文字典为苏联西夏学的扛鼎之作。1963年克恰诺夫教授等出版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第一次使世人了解到俄藏黑水城文献有400余种。日本的西夏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二三十年代的石滨纯太郎,50年代以来的冈崎精郎、西田龙雄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此外,英、法、美、韩、匈牙利等国也有不少学者研究西夏历史文化。

我国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首推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苾父子。1914年罗福成发表《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同年其弟罗福苾著《西夏国书略说》。1915年罗福成又撰《西夏国书类编》。这是中国学者最早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译释和研究,特别是罗福苾对西夏文字的形、音、义和西夏文文法作了有益的探索,找出了一些规律,所创的西夏字偏旁说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1918年和1924年罗振玉和罗福成先后两次刊印黑水城出土的夏汉双解小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1935年罗振玉又抄写并刊印黑水城文献《音同》,这两部西夏文字典的面世,使西夏文字进一步释读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西夏文献研究的展开。继罗氏父子之后的王静如,在30年代初相继发表《西夏研究》1~3辑,除主要对西夏佛经考释外,还涉

及到党项与西夏历史、语言、国名、官印等方面的内容。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刊出西夏文专号,内容包括黑水城考古介绍、西夏文文献译释、西夏文文献目录等,由中、苏、日三国专家撰稿。

二三十年代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苕、王静如等和外国学者一起,共同把西夏学研究推向新阶段。正如俄国西夏学专家戈尔巴切娃所说的,西夏学的新阶段“是同聂历山、王静如、罗福苕和石滨纯太郎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国学大师陈寅恪、王国维,著名学者周叔迦、向达等也对早期西夏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或诠释文献,或考证文物,筚路蓝缕,收获粲然。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西夏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大大拓宽,并且大体形成了宁夏、北京、甘肃等几个研究机构和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这些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考古发现层出不穷。1972年在甘肃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岷亥母洞中发现西夏时期夏、汉文书、佛画、发愿文、医方、占卜辞、日历、以及牛皮靴、石纺轮等近百件文物;1972—1975年以及近年对银川西夏王陵考古调查与发掘,基本上考订出帝陵9座,陪葬墓140余座,出土了大批建筑构件、金银饰物、竹木雕刻、丝绸织物以及鎏金铜牛、妙音鸟等珍贵文物;1964年与近年两次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遗存进行了全面考察,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确定了百余座西夏时期妆饰或开凿的洞窟;1983—1984年对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的调查发掘,出土近3000份文书;1984—1986年宁夏灵武磁窑堡西夏窑址的发掘,出土生活器皿、文房用具、娱乐用品、建筑材料、生产工具等2500余件;1990年宁夏

贺兰县宏佛塔出土的大量西夏文雕版、彩画版等珍贵文物,被《中国文物报》评定为该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1年宁夏贺兰山拜寺口方塔出土9册10万字西夏文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还发现了许多西夏时期的城址、墓葬、寺庙、佛塔、窖藏,出土了大量钱币、瓷器、官印、符牌、壁画、岩画、版画、碑刻、佛经、雕塑等文物。

在上述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文物考古与西夏学界相继推出了《西夏陵出土残碑粹编》、《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研究》、《西夏陵》、《西夏王陵》、《西夏佛塔》、《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黑水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等发掘报告与研究著作。

(二)文献整理与语文研究成绩显著。1909年俄人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黑水城掘走的西夏文文献,除大量佛经外,还包括字典、辞书、类书、法律文献以及译自汉文的兵书、类书、儒家经典等,它们极大地丰富了西夏研究资料。但由于苏联方面未能公布这些原始资料,中国学者只能利用他们已出版著作中的西夏文影印件重新译释整理与研究。这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二十多年来我国学者相继出版了《文海研究》、《同音研究》、《番汉合时掌中珠》(整理本)、《西夏谚语》、《类林研究》、《夏译〈孙子兵法〉研究》、《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圣立义海研究》、《贞观玉镜将研究》、《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西夏语比较研究》等重要著作。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研究和出版机构达成共同编辑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协议,现已出版11册世俗文献,佛教文献正在编辑中。我国台湾学者发表西夏语言文献研究系列论文,也即将在大陆结集出版。

汉文资料方面,或从浩如烟海的正史、野史、文集、笔记、小说、碑铭中披沙淘金,搜集、整理西夏史料,或点校明清有关西夏著述,

出版了《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与《西夏纪》、《西夏书事》、《西夏纪事本末》、《西夏志略》等史籍。

(三)社会历史研究全面展开。三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大批文献资料的整理面世,有力地推动了西夏学的全面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广泛搜集汉文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西夏史稿》与《西夏简史》,是新时期西夏历史研究走向新的开始的标志。此后,利用新公布的西夏文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结合汉文文献资料,对西夏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相继出版了《唐代党项》、《元昊传》、《西夏文化》、《党项史研究》、《西夏佛教史略》、《辽夏金经济史》、《西夏战史》、《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西夏文化概论》、《简明西夏史》、《宋夏关系史》、《西夏道教初探》、《西夏美术史》、《西夏经济史》等等。这些成果,使我们对西夏社会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诸如党项民族的起源与变迁,西夏的社会形态、经济发展、政治军事制度、民族关系、文化艺术等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四)研究队伍培养壮大与专门研究机构相继建立。50年代我国的西夏研究几乎是空白,像四川大学吴天墀先生默默进行着西夏史研究的学者乃凤毛麟角。60年代初,老一辈西夏学家王静如先生又开始了西夏文史的研究,并着手招收研究生,培养新一代西夏学研究人才。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学习与研究西夏学的人非常少。70年代以后情况大为改变,首先随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众多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加入到西夏研究的队伍之中,紧接着文献学、语言学、民族学、藏学、敦煌学、佛学以及宋辽金元史等学科的专家相继加盟,仅1981年首届国内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就收到40多位作者撰写的50余篇论文。80年代开始,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宁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河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相继招收西夏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90年代以来,我国西夏研究蓬勃发展,专门研究机构相继成

立。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多年西夏研究的基础上,成立西夏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在宁夏博物馆常年展出西夏文物的同时,银川市又在西夏王陵建立了颇具规模的西夏博物馆。宁夏大学一直十分重视西夏研究,1991年成立西夏历史研究所与西夏文化研究所,1993年两所合并为西夏研究所,2000年更名为西夏学研究中心,2001年该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五)西夏学学科内涵日趋成熟。今天的西夏学和敦煌学、藏学、蒙古学一样,是一门涵盖面非常广泛的综合性学科,大体由西夏语文学、西夏考古学、西夏历史学三个分支学科组成,它的形成经历了几代学者不懈努力的历史过程。“西夏学”一词,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一些有关西夏研究的论著中使用,当时主要指对黑水城西夏文献和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王静如先生在《西夏文专号》引论中曾用“西夏字学”一词来表述。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等国的学者加强了西夏历史文化的探索,西夏学实际上已超出了黑水城文献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范畴。80年代以后,我国对西夏语言文字、文物考古以及社会历史研究全面展开,西夏学内涵由过去对黑水城文献与西夏文字研究,拓展到对党项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文献、考古、文物、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研究的事实,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它表明作为完整科学意义上的西夏学已经形成,这是百年特别是近二十年西夏学发展了不起的成就!

三

在充分肯定新时期我国西夏学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西夏学学科建设仅仅是开始,以后任务还很艰巨,要使西夏学有更大的进展,必须在学术队伍、情报资料以及研究课题方面

有重大突破。毋庸讳言,目前西夏研究队伍状况不容乐观,五六十年代的老专家多已退休或即将退休,培养的研究生数量不多,且坚守在这一专业领域的更少;研究者专业面过窄,或限于考古,或限于历史,或限于语言文字,缺乏文史兼通又掌握民族学、文献学、敦煌学以及宋辽金元史、吐蕃史、回鹘史等多种学科知识的通才等等。因此人才的培养,特别是文史兼通又掌握多种学科知识的学科带头人的培养,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必须引起西夏学界与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和《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为今后西夏学资料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要做的工作还非常多:1. 加强对《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研究与译释,向海内外读者提供信实的汉译本;2. 积极争取与俄罗斯联合影印出版俄藏尚未整理的西夏文献;3. 与文物考古部门通力合作,尽早公布近年乃至近十年来西夏考古发掘报告以及新发现的文物资料。积极争取政府或企业投入,收购流散民间的文物资料;4. 组织西夏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的专家对西夏遗民进行调查;5. 建设西夏学网站,实现西夏文献情报资料网上共享。

研究选题上视野要开阔,应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高度,充分肯定以党项羌为主体的西夏政权在开发我国西北地区及推进西北地区局部统一的基础上,对元朝中华民族大统一的历史贡献。要抓住对学科建设有带动意义的重点、难点问题,诸如俄藏黑水城文献译释,西夏语音、语法系统,西夏经济结构演变,西夏政治、军事制度之特点,西夏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形态等等,求得突破,从而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提倡团队精神,组织多学科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编辑出版《西夏研究丛书》与《西夏文化丛书》等。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为教育部批准的全国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承担着西夏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的重任,它的目标是争取五年至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把该研究中心建

设成全国西夏学研究基地、西夏学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基地、西夏学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基地、西夏文化开发与咨询服务基地以及高校科研体制改革示范基地。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创造必要条件,增加有效投入,联合国内外力量,建立起科学的管理体制。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一目标一定能实现!

陈育宁
2002年2月

【陈育宁】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在《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专著《民族史学概论》、《塞上问史录》、《北方民族史论丛》,主编《宁夏通史》、《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等十余部。

导 言

西夏文献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字载体看,可分为西夏文文献、汉文文献、藏文文献及梵文文献等,其中西夏文文献为其大宗。客观地说,西夏文文献应该是西夏文献中最原始的文献,因其原始,故而可信度最高。但汉文西夏文献在西夏文献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从已公布的各种原属西夏国的汉文文献看,其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以《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中收录的材料看,文献的种类非常多,包括佛经、道经、儒家经典、医书、历书、占卜书、字书、文书、文学作品、史书等。除原属西夏国的这批汉文文献外,还有一类与西夏相关的汉文文献。这类文献的编写者主要为汉人,亦有少数西夏后裔,他们以西夏国为记述对象,对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典章制度及民风民俗、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深入介绍,形成的文献或以专书方式传世,或以专题方式存在于其他文献中,有些则散见在其他文献中。本书研究的对象就是此类用汉文撰写的、非西夏国原有的、但与西夏国有关联的历史文献。汉文西夏文献是中国汉文古典文献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汉文西夏文献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丰富中国汉文古典文献的研究内容,同时更有利于西夏学学科体系的健全和发展。

汉文西夏文献,自宋迄清,代有其书。按照此类文献自身的特点,我们将汉文西夏文献的发展分成四个时期来加以研究,这四个时期是,宋朝(包括北宋和南宋)、辽金元三朝、明朝、清朝。我们在

对汉文西夏文献按时期归类时,有别于传统的归类方法。传统归类法以史书本身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来分期归类,如把由元人编写的《宋史》当做是研究宋朝历史的基本史料,因而把它放在宋朝史料部分来研究。为客观反映不同时期汉文西夏文献编撰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以文献编著者生活的时代为分期归类的依据,编著者主要生活在哪一时期,他所编著的汉文西夏文献也一并归入那个时期。如《宋史》由元朝人所编写,反映了有元一代史家所掌有的历史文献的情况,我们把它放到元朝部分介绍,就是为了突出元朝在编撰汉文西夏文献时取得的成就。

宋朝是汉文西夏文献的初编时期,由于宋夏战事的客观需要,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汉文西夏专书,时人编著的历史文献中有些也设有西夏专题,另外,一些史书、文集及笔记中也散见有丰富的西夏史料。宋人著西夏专书传世者很少,而西夏专题文献和其他散见史料大多传世至今,成为今天治西夏史最直接的汉文原始材料。辽金元三朝是汉文西夏文献的删汰选编时期。元灭夏后,为西夏修史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元朝史家的肩上,但是,元朝史家在统治阶级的授意下,秉承正统封建史学的修史思想,对元朝尚存的大批西夏文献“精心删汰”,编写出了只有四卷内容的三史《夏国传》,另外一些西夏材料则散见于宋、辽、金三史中。这样,大批珍贵的西夏文献在元朝三史修成后都亡佚了,而三史《夏国传》及散见于三史中的西夏史料就成了后人研究西夏的基本史料了。明朝是汉文西夏文献的重修考证期。鉴于元朝史家留给后人的遗憾,明朝有学者开始注意对汉文西夏文献重新辑录,试图编著新的西夏专史,祁承燾的《宋西事案》就是这种尝试的产物,但取得的成就不高。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明朝学者在编修宁夏地方志时,开始重视宁夏历史上的西夏时期,选材上注意对西夏史料的利用,同时开始有意识地爬梳西夏史,力图对西夏史做出全新的考证,在这方面,朱橚开其绪,胡汝砺毕其功。清朝是汉文西夏文

献编修的勃兴时期。受乾嘉学派考据学风的影响,清朝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西夏历史,他们钩沉索隐,从各种历史文献,尤其是宋元历史文献中辑录出了大量的西夏史料,在各自的编史思想指导下,编写了数量可观的西夏专史。这其中有周春著的纪传体的《西夏书》,有张鉴著的纪事本末体的《西夏纪事本末》,有吴广成著的纲目体的《西夏书事》。另外,西夏史的专题研究也日渐深入,如徐松著《西夏地理考》,对西夏地理进行深入考证,张澍辑录的《西夏姓氏录》对西夏姓氏、职官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材料,王仁俊辑录的《西夏文缀》则对西夏公文研究提供了材料利用上的方便。总之,只有到了清朝,对西夏专史的编修才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对西夏的专题研究也开始有了新的成果。受清人及出土的西夏文献的影响,近代学者也开始对西夏文献进行爬梳整理,相继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西夏专书,如戴锡章编著的《西夏纪》、罗福颐辑录的《西夏文存》、罗福苾和罗福颐合著的《宋史夏国传集注》、李鸿仪编撰的《西夏李氏世谱》等。

在古今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夏学的研究正不断取得越来越大的成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代学者治西夏学,对西夏文文献的研究用力最勤,对汉文西夏文献则是整理、利用的多而研究者少,现有的某些研究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商榷。有鉴于此,笔者想抛砖引玉,试图对自宋迄清的汉文西夏典籍及散佚文献做全面考证,尤其把汉文西夏专书做为重点介绍和分析的对象,力图在汉文西夏文献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在研究西夏专书时我们拟解决这样一些主要问题:1. 编著者生平事迹。为达到知人论书的目的,我们从各种文献中辑录材料,经过缜密考证,对编著者的姓氏字号、籍贯、生卒年月、仕履、学术成就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弥补编著者生平事迹不详的某些缺憾。2. 典籍成书年代问题。主要从分析目录著录入手,梳理不同时期著录上存在的差异,理清典籍的版本源流,结合编著者生平,对典籍的成书年代加以考

定。3. 典籍卷帙问题。有些西夏专书,目录著录的卷数与传世本有出入,我们就从版本源流上寻找线索,澄清著录本与传世本卷数不一致的原因,最后确定一个相对可靠的卷数。4. 恢复典籍本来面貌。有些西夏专书以残本传世,后人在对其做整序缀合工作时,有失误之处,我们通过缜密考证,对其重新整序缀合,以求恢复典籍原貌。5. 归纳不同历史时期汉文西夏文献的特点。结合不同时期文献学发展的特点,我们对不同时期的汉文西夏文献分别归纳其成书规律及特点,以便于对某一个时代的汉文西夏文献的特点有整体把握。

文献考证最忌“孤证”,而我们在考证某些问题时甚至连“孤证”都找不到,所以借鉴前辈或同志的成果自然很有必要了。为不夺人之美,文中有所借鉴之处均有标注,对原作者之意若理解有误,责任在笔者。由于材料的缺乏,我们在研究中常常扼腕叹息,个别关键材料明明可以按图索骥,终因囊中羞涩而浅尝辄止。所以,拙作中疏误之处一定很多,敬请专家指正。